

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重建”

“文化重建”在我心目中其实是个负面词，我们往往是通过不断破坏“文化”来进行“重建”的，更可悲的是，“破坏”可能恰恰是打着“文化重建”的旗号才得以合法展开。原因何在？正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观，或以此作为把握各种人文叙事的基调和依据，其中包括历史叙述，当然还有影像叙述。

现代化历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认同与张扬，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影像或者历史叙事在表达这个必然性主题的时候，很难把握在这个“必然性”的不断表现过程中，具体的“人文”位置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现在

舆论界谈“文化重建”，具体说就是谈“国学”复兴，谈“传统文化”，再具体就是搞谈经、唱京剧、穿汉服，这些活动都是从属于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下进行定位的。但我以为如果不改变大国崛起论式的粗放型历史观，任何所谓重建都是急功近利的举措。

“文化重建”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问题，但我们的人文和文化精神的理解及其转化路径却难以真正影响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正因为当代“文化”没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因此在面对西方压迫的时候，总是采取一些极端对抗的形式。“国学”可能以畸形变形的形式堕入了西方所构建的知识谱系，也有可能不自觉地变成西方学术在中国的表述样本。

选自《读书》第7期 杨念群文

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

从公开信到公开信，从汪晖到朱学勤，尽管事态发展中隐约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已有评论表示担忧，希望学术打假莫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我们此时仍愿意相信，越来越“热闹”的讨论甚至纷争，是学术这一“经国大事”在公共性意义上得以提升的途径，而非滑向闹剧的起点。

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就很简单，也很明确：当事人是否抄袭？需要启动什么样的程序来查清事实？若抄袭属实，当事人该负何种责任，该如何处理？以汪晖教授在国内及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里，我们一直期待围绕他的这起事件成为一个契机。如今，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面临和汪晖相似的抄袭指控。以朱教授的学界分量，我们投以同样的期待。我们的期待是：廓清学术底线，明确学术规则，完善学术机制。底线，意味着治学者要有基本的尊严，也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对这种尊严及相应的行为准则有基本的共

识。规则，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对突破底线的行为能够进行有效的辨识、调查及处理。机制，意味着学术共同体需要提供一种保障，这种调查和处理不会因时、因事或因人而异。

我们愿意相信这两起抄袭指控事件及公众对此的关注中，蕴涵着这样的契机。然而，我们并未天真到无视其中的纠结。让问题变得复杂和模糊的，先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并由此在学界形成不同的“山头”和派系。学术政治难以避免，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一个最大恶果便是，学界割裂到了伤害以至击破基本共识的地步。这是中国学术的大悲哀。在理想的视阈里，这两起事件本是学界修复共识的契机。我们一方面乐见其成，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还存在他种可能性，即击破基本共识的力量有着太过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将裹挟这两起事件，从而错过这个契机。一旦错过，惯性的前方就是闹剧。

首先，请以我们的态度切断这种惯性。两封公开信，尽管立场并不一致，但我们愿意从中提炼出共同的对学术的诚意。两次抄袭指控，一用真实身份一用网名；两位当事学者，一个保持沉默，一个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将撰文回应，并“非常希望启动调查机制”——但我们愿意相信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珍惜自己治学者的身份和尊严。有了意愿，有了相信，事件才有可能往良性方向发展。其次，请相关学术机构在处理这两起事件时表现出足够的智慧，以切断这种惯性。一套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回避纠缠的学界恩怨，激发事件潜在的积极意义。而欠妥当的方案，或者一味拖延，拒绝正面解决，则将放大事件潜在的伤害力量，进一步割裂中国学术界。总之，我们所期待的，不要以派系之争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要以诛心之论裁定相关发言者的动机，也不要因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而坐失良机。

选自《中国青年报》7月14日

『蚁族』现象背后的教育问题

最近的畅销书《蚁族》描述了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校门不久的知识分子的就业和生存状况。这本书采用了切片素描的人类学方式来研究当代大学生毕业后的真实生存状况。读罢《蚁族》，又读了《茅盾散文》。本想二者无甚关联，却发现它们在子女的教育和前途选择的问题上，都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只是所探索问题发生的时代大不相同，正是在这种比较和关联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判断。

1934年，茅盾先生在《升学与就业》一文中写道：“翻开报纸一看，满眼是中等以上学校招生的广告，但是满报纸的夹缝里却又是影影绰绰满了九个大字：‘知识分子失业的恐慌。’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曾经‘升学’过来的。”看来80年前中学生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所谓博士后。但是，这两个群体面临的问题几乎是同样的，即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与茅盾先生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蚁族》描述的不是人们面对失业的恐慌，而是失业和再就业道路上的艰辛。像80年前一样，当下的中国教育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拼命地制造产品，社会却又不能消费这么多的产品，于是就有了学生们“失业的恐慌”。因此不要简单地抱怨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大学扩招带来的恶果。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我们多半不愿意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数不胜数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和结论，渗透到学术界和决策层，结果误人害己。

很多年轻人敢于放弃诱人的职业，敢于面对社会，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究其原因，很多父母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父辈们所期望子女获得的就业机会其实少之又少，父母一辈当然希望年轻人成为精英，事实上，最终只有3%的人能够进入这个父辈们理解的所谓精英群体，其他人都是有心无力，不了了之。只是大部分父母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一味地鼓励子女在一条道上拼搏，造成了就业难。当前真正需要的，是一次解放父母思想的运动。要让父母们给子女在就业问题上更多的选择空间。

如果父母的思想解放一点，给孩子选择的天空大一点，父母自己会怎样？孩子会怎样？社会会怎样？如果是这样，父母们的生活和工作会轻松一百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工作做好，把生活安排好，会在养生中实现养老，将来会给孩子带来更少的负担；孩子会有一个愉快的成长期，在这个愉快的成长期里，他们的身心会更加健康，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快乐；社会会更加多元和充满创新的活力与动力，人们不必万马齐奔在那些世人看来的独木桥上。一个有着更多选择的社会更加有序，其基础奠基于家庭、延续于父母。

选自《文化纵横》第6期 丁元竹文



真诚的唐骏

选自东方早报网

国外如何传承格律诗词

近来，一份“关于格律诗词创作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倡议书”在网上流传甚广。格律诗词是否需要以申遗的方式来实现延续的目的，日韩越等国家的格律诗词现状如何，它们又如何实现对格律诗词的保护呢？

日本的格律诗包括汉诗、和歌、俳句等。今天日本仍有许多短歌和俳句的爱好者，它们往往以诗社、雅集或踏青联句的形式创作和交流。短歌、俳句同时也是日本许多中学的选修课程，“百家诗纸牌”和印有短歌、俳句的卡片、纸扇，是日本名胜古迹常见的纪念品。日本俳句能留传至今，与日本对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比如，日本有一个社团法人俳句人协会——俳句文学馆，拥有15005名会员，除了每年举行全国俳句大会以外，还在日本各地举行俳句讲座，出版协会刊物。日本的学生俳句协会从197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学生俳句大会，每次征集30万首俳句。日本著名的伊藤原茶铺也在电视广告里征集学生创作的俳句，获奖者可以免费得到一年的罐装茶；由教育界人士组建的日本俳句教育研究会，专门研究如何在课堂上进行俳句教育；日本反战人士组成于1946年的新俳句人联盟至今仍在开展活动。

韩国的格律诗分为汉文和韩文两种。韩国曾长期使用汉字，如今汉字在韩文中使用率虽然大为减少，常用的韩国汉字只有几十个，但韩文的谚名可以将汉字逐字注音。如今韩国在成均馆等机构中仍有汉诗教学，端午祭等传统活动期间，也常能看到韩国汉诗的影子。一些韩国汉诗爱好者也在网上和中国格律诗爱好者交流。韩国格律诗称为时调，源自韩国民歌。韩国独立后，时调受到新诗的强烈冲击，让出了主体地位，但仍然十分流行和普及。号称“战后时调四支柱”的赵炳华、徐廷柱、朴斗镇和金寿洙都在1990年出版诗集，而新一代的时调诗人也层出不穷，韩国目前经常发表诗歌的作者有数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以写作流畅的韩调。

越南同样有源于本土的格律诗体裁。早在使用汉字时期，越南就在民间传起一种“六八诗体”，即一句六个字，一句八个字交替出现的诗，后来，又在六八诗体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格律诗体裁“双七六八诗体”。这两种诗体既可以写成短诗，也可以写成很长的诗篇，甚至剧本、故事和长篇诗歌小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越南在推广格律诗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即格律诗本土化。许多中国古代诗歌、戏曲和曲艺，都在翻译成越南语时，被刻意写作成“双七六八诗体”，读来别具意味。

选自《环球时报》7月9日 蒋丰、刘薇文

搜索时代的罪与罚

有人显影，有人遁形，互联网搜索领域，近来好热闹。新闻称，在假药销售利益链中，百度通过竞价排名独得75%。这证明了搜索引擎的强势。我们已进入一个搜索时代。能够被搜索到，本身就成为一种“生产力”。与百度合作，是为了在搜索时代“露脸”或“混个脸熟”。但竞价排名有违搜索引擎创设的初衷，即互联网自由搜索的精神实质，是带着“原罪”的玩意儿，“混”总有“还”的一天。隐秘利益链条显影，是否还有其他人该负其他责任——比如，商业操守责任及更广义的道德责任？

《中国日报》报道：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被揭露学历造假之后，互动百科网站上约100名中国“精英”的简历被修改。有人拼命要在网上留下痕迹，好让人搜到，让人上套；也有人拼命要抹去某些痕迹，好让人搜不到，让人忘掉——这便是有趣的网络现实。实际上，搜索引擎具有某种类似媒体的公共属性。公平不是它所能裁决的，但公正，包括客观中立，是它在向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呈现结果时须追求的。进入搜索时代，意味着搜索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网路行为，也构成一种越来越具有现实效应的社会行为。新近发生的这两个案例，正切中我们社会的弊端。

假药网站的案例呈现双重复假的特征。

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吗

很多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开发当成摇钱树，聚宝盆，却从不去考虑房地产业的利润来源。本质上讲，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开发环节伐木、采矿类似，其特征都是专注于对存量资源价值的获取。区别仅在于伐木采矿得到的是有形的森林矿产资源价值，而房地产开发获得的是无形的空间资源价值。我们常说烟草业是“愚人的金库”，离开自然资源和政府持续投资形成的人工资源这两块唐僧肉，房地产开发哪里会有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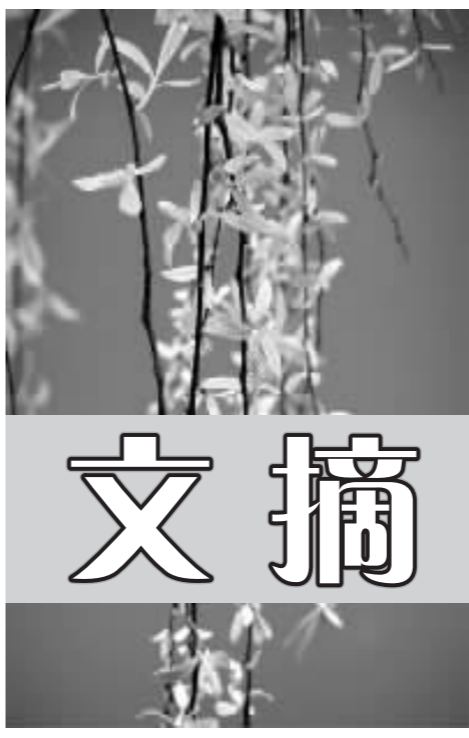
如果房地产业属于“支柱产业”，那么烟草、采矿这些行业毫不逊色，它们同样拉动了若干行业，同样是利税大户，甚至受某些地方保护的制假、盗版等黑色产业也算。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靠采矿、烟草、制假成为大国，同样，没有一个大国靠开发房地产“崛起”。说到底，这些行业都是被动的价值转移型行业，只能凭借制度漏洞掠夺财富、孽生腐败，并加重环境压力和过度消耗资源，根本不具备可持续性。

讽刺的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有充分证据表明，房地产业倒是不折不扣的欺诈和偷漏税大户。不仅如此，房地产业

“掠夺财富”的示范效应还在侵蚀我国真正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它通过隐蔽的方式将社会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并以高税收面目示人，实质上成了经济的兴奋剂。现阶段房地产业的非正常暴利冲击着正常的经济生态，其实是在鼓励不劳而获和投机取巧，以至于很多企业家干过房地产后更不想去干别的行业，甚至有开发商表示挣钱已经到了“不好意思”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以炒房为生活追求。国内上市公司超过一半都涉足房地产业，甚至象征着民族科技和制造业旗帜的联想、海尔都组建了专门的房地产公司。

从消费角度，高额的房地产消费压得工薪阶层喘不过气，被迫成为房奴，而在现行体制下房产“只涨不跌”的长期预期又吸引人们被动投资、欲罢不能。住房支出极大地挤占了人们其他正常消费支出，透支未来收入，很多城市过高的住房成本已经对优秀人才开始形成挤出效应。长此以往，我们靠炒房投机为“支柱”的经济体系怎么可能会有可持续性，我们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作为，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

选自《南方周末》7月8日 杜恒文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6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读了塞维尔报告的结果，并正式向38年前“血色星期日”的受害者家属道歉。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在1972年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有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痛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卡梅伦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驳的。“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选自《南方周末》7月15日 刘瑜文

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

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许多新词汇，“剩女”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有人认为，“剩女”现象是女性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这些女性的女权主义意识过强，所以不能与男性妥协而组成传统的完美家庭。换言之，“剩女”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传统价值判断的词，内含讽刺“嫁不出去”的大龄女青年的贬义，同时也暗讽现代都市女性过于个性化、过于自我与女权主义意识过强的生活方式。在国内，“剩女”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这些“剩女”被社会遗弃，被推向边缘，是社会把她们变成了“多余人”的，也可以说，“剩女”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中的“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虽然是社会把这些先进的贵族推向“多余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主动地选择了“多余人”的位置。他们的这种选择，并不只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个体有意识而能动地去思考与探寻人的心灵与灵魂的一种方式。在我的眼里，“剩女”就像这些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主流的世俗的价值格格不入，但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是值得敬重的。她们重视的是如何做一个不卑不亢的依靠自己能力生存的人，而不是成天琢磨如何能够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就是说，她们把重心放在自己的独立价值上，而不是仰仗男人的恩赐与救赎。如果真正的爱情来临，她们也一样会爱得天翻地覆，但是当真正的爱情没有来临时，她们也不怨天尤人，因为她们有养活自己的手艺，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房间，有不随波逐流的意志，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男人的价值世界里，她们硬是勇敢地开辟了一个充满女性气味的感性世界，并不为俗世的观念所动摇。“剩女”这个新词汇，从表面上看仿佛是由年龄所命名的，但从深层上看，还是由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所规定的。为此，我们不仅要为剩女的青春请命，而且要为她们的智慧、勇气、尊严和独立的人格请命。

选自《书屋》第6期 刘剑梅文

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余震》近日出版，作者张翎表示，与小说相比，改编后的电影基调更温暖。她说，电影对小说的改动比较大，她的小说更着力表现那场灾难在经历者内心深处造成的强烈余震，强调的是“疼”，但在电影里，疼痛感被温暖所取代。她说：“《余震》写于2006年，那时灾后儿童心理干预还是相对陌生的话题。我想通过对疼痛的描述，引起人们对灾后心理创伤的关注。小说结尾，接受专业心理辅导后，小灯有了‘推开心灵之窗’的可能性。电影把这个可能性拓展成了现实，把小说的留白补实了。”另外，小说以女儿小灯为主线，电影则变成了母亲、女儿、儿子三条线并行，尤其加重了母亲的戏份。张翎对这样的改编表示认可。

选自《京华时报》7月21日

《唐山大地震》原著者谈电影改编

“城”长的烦恼

在中国大陆，上海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最符合一般人想象的“大都市”。尽管2010上海世博会的口号“better city, better life”早已妇孺皆知，但人们对城市的疑虑和担忧，仍在不断增长。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城市生活中的安全、健康、满足和幸福，正与我们渐行渐远；也因为当城市的一颗心要成为高楼大厦的大本营、交通堵塞和噪音污染的同义句、盲目扩张的庞然大物、垄断权力的盘踞之所、资本和人力恣意流动的集散地、人间天堂与享乐和罪恶痛苦的最终源头的时候，人们失去了对它的信心和想象力。人和城市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危机。

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由这样一种城市想象所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却在愈演愈烈。几乎所有困扰社会的重大问题：土地、房价、经济增长模式、“中产阶级”、社会民主、腐败、“部门垄断”……总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合。一个尖锐的问题也因此出现：当城市生活的矛盾不断涌现，“赢家通吃”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将社会推入危机的时刻，“城市化”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因此，对上海乃至中国而言，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带来的不仅是高科技的演示和八方来客，更应该为人们重新思考“城市”、想象城市生活提供重要的契机。毕竟，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城市”从来不等于“美好”，相反，它很可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城市，有问题。

在今天的城市中，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谁是城市空间的真正主宰？城市生活的速度，果真越快越好吗？城市生活中的自然环境如何生成，又该如何保护？城市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生活就越现代越幸福吗？一座体积庞大的城市和周边区域乃至其他城市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方才合理？当前的城市文化，由哪些渠道和力量塑造而成？这样的文化好吗？什么是真正 better 的城市文化？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它的记忆？我们居住在这里，可我们拥有这座城市吗？这座“我们”的城市，又愿意对所有人开放吗？

对今天中国的城市生活来说，这些问题看似古怪，却值得大声提出和仔细回味。想要在城市里真正享有“美好”，想让中国的城市在这遍布陷阱的时代走出一条新路，首先需要开启的，恐怕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全社会的讨论。

选自《“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编者序言 王晓明文

本版责编：饶翔 王杨

小说死亡论再掀波澜

新锐评论家李·西格勒近日在《纽约观察家报》上撰文声称小说已死，引发全国震荡。他的文章在美国引发了一些流行文化正当性的拥护者群起而攻之。而有些人恰恰认为，正是流行文化会夺去小说的命。去年秋天，菲利普·罗斯曾公开感叹如今小说的路越走越窄，读者正在加速远离文学，转投互联网和电视的怀抱。因此未来25年内，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将成为只有少数狂热信徒膜拜的“异教”。早在2001年，英国作家安德鲁·马尔也曾在《卫报》撰文，宣称英国小说已死。现在面对大西洋对岸的类似断论，英国文坛也不得不再度审视这一问题。评论家罗伯特·麦克鲁姆7月5日在《卫报》撰文，从自己的观感出发，认为西格勒的结论错了。他认为“这是英语创作的黄金时代，新式写作的盛世”。不过，他指出了目前文学出版界和时代文化的重要变迁。首先是美国的小说文化趋弱，相较15年前，如今报纸的书评版面已大为缩减。其次，面对主流媒体日益忽视，新技术革命大敌当前，出版商焦虑不安，甚至质疑文学出版是否已成夕阳产业。第三，文坛正处新老世代的青黄阶段。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贝丽尔·班布里奇于7月2日在75岁上辞世，美国也有一大批文学家中坚在最近几年先后故去，如索尔·贝娄、威廉·斯塔隆、库特·冯内古特、诺曼·梅勒和约翰·厄普代克，余下屈指可数的几位也已七老八十，如菲利普·罗斯和汤姆·沃尔夫。但新一代作家尚无力填补老一辈留下的鸿沟，值此文化转型为“全球语”一统天下的时代，新人们撒立于市场仍需时日。此外，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确已对“纯文学小说”渐失耐心，它们由文学大奖推动，长年占据媒体头条，如今已生审美疲劳，吸引力下滑。伦敦《观察家报》指出，或许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所言，小说是一种周期性地自我更新的文化形式。“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的特殊命运便是它总要面临死亡，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最有才华的小说家和读者始终会感到一种巨大的隔阂，其间充满了荒谬，映衬着现实世界与小说中所描写世界的不同。”

选自《中华读书报》7月7日 康慨文

简·莫里斯的游记《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

简·莫里斯从加入《泰晤士报》，几乎立刻开始了周游世界的生涯。她之所以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游记作家，也许是因为她首先是一位记者。她相信，“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身为记者，莫里斯有幸见证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她在1953年第一个报道了珠穆朗玛峰首度被人类征服；1960年她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了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她在以色列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她在哈瓦那采访过格瓦拉……《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二战”初到千禧年终结。它反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变化：从24岁到74岁，从詹姆斯变成简——1972年她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做了变性手术，她的文风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某些批评家说后来她的写作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解放感。

在全书的结语中，莫里斯写下了她对这半个世纪和自己一生的总结：“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颖的头脑用各种胡思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第28期 小贝文